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考古图

外五种

「宋」吕大临等著
廖莲婷 整理校点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考古图

外五种

〔宋〕吕大临等著

廖莲婷 整理 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图：外五种 / (宋)吕大临等著；廖莲婷整理校点.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8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317 - 3

I. ①考… II. ①吕… ②廖… III. ①金文—考古—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257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考古图(外五种)

[宋]吕大临 等著

廖莲婷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317 - 3/K · 240

定 价 45.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玕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鸢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易》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究，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远古人类在长期劳作过程中，发明创造的各类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包括石器、木器、陶器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粘土烧制的器皿，商周时期又出现大量的青铜器，这些器物，或为生活用品，或用以祭祀、祈福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的还刻有记载着当时许多事件的铭文，对历史考证颇有价值。

我国出土的古器物数量尤以青铜器为多。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有中心地位。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出现远在青铜时代以前，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时代，青铜器的显著重要性成为不疑的事实，中国青铜时代持续了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之久。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数以千计。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青铜器等器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品种繁多、造型丰富。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礼器、乐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各种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单在酒器类中就有爵、角、觥、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盃、觚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

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更具有吸引力。

二是千姿百态、制作精湛，具有诱人的艺术魅力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在于数量之多，而是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青铜器制造到达顶峰，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性。它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制；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

三是不少器皿刻有铭文，成为见证历史的重要资料。中国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相比，这是中国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这在商代中期就已开始，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 48 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达 497 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

重要依据。

四是以青铜礼器为大宗。与世界青铜器多为武器不同，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末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当时，青铜礼器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还被随葬而埋入地下。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成为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五是青铜器作为贵族身份地位的表征，具有严格的组合形式。中国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制度在青铜器上的“物化”，用以表明奴隶制等级制度，器的多寡、不同的组合形式显示不同的地位、身份，墓葬如贵族一觚一爵、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

对于青铜器等器物的著录，在宋代就已经发展成一门学问。宋代是传统考古学和考古图谱兴盛的时期，其成就世所共知，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以宋、清两代的传统古器物学为基础，引

入西方考古学建立起来的。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宋人开始以书籍著录所见之古器，产生了一批专门记载古器物的图书。在这些书中，以礼器为主要的记载对象，常被人由“器”提升到“道”的精神层面。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相当森严，特定的场合需要使用特定的器物，这些器物则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味，产生了特定的精神内涵，礼器尤其如此。在礼制的规定下，不同的人群依据其身份地位等级的不同而使用相对应的器物，礼器因而成为重要的礼文化载体，祭祀、宴飨、丧葬、征伐都离不开它们，透过可见的器物和仪式，后人便能窥见形而上学的思想，即前人所言“由形而下之器而会形而上之道”。

考古图谱乃是记录古器物的形制及其铭识的一类谱录图书。传统书目中的器物之类属，定型于《四库全书总目》，以博古、文房、器玩为主。器物类属的确立大抵经历了以下过程：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于子部的下位类目设立“谱录类”，著录《考古图》等书，开创了“谱录”一门，但其中还又著录了诸如《警年录》《侍儿小名录》之类的著作。至清代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则除于子部下设立“谱录类”外，还明确了“器物之属”“食谱之属”“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个下位类目，由此而定“谱录”之类属，专指记载器物的《考古图》《啸堂集古录》《绍兴内府古器评》等书。根据《四库全书总目》阐述的原则，考古类谱录的内容主要是记录古器形制及款识铭文，涉及古器的名称、藏家、图像、尺寸、重量、容量、铭文、释文、考证等。宋代考古类谱录的撰写多有承续的特点，即后谱承续

或借鉴前谱之内容的特点。如后出的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多有承续前人著作，收录了大量前人考古类著作的内容如黄伯思的《博古图说》、李公麟的《古器图》。而可惜的是，谱录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后谱出而前谱亡的现象。而那些亡佚的博古类谱录，对后世经典考古类谱录的出现实在功不可没。

考古类谱录的内容由于涉及铭文的记录和考释，很容易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小学类”的“字书之属”产生内容上的重叠；同时考古类谱录又是记录古器物形制的图书，又很容易和“史部·目录类”的“金石之属”相混。但细析三者内容，仍存在着颇为明显的差异。著录于“谱录类”的图书在于记录古器物的体制，其款识是因记体制而旁及，所以内容为记器物之形制或因记形制而及其款识的归为谱录类，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因器及铭者”。而为考释器物上的文字而非古器的体制的图书则为“小学类”，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著录《钟鼎款识》的原因为“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所以，通过“因器及铭者”的原则，这是把谱录类和小学类图书区分开来。同样，为搜集记录“古刻”条列其名目的图书即归入目录类，如《四库全书总目》因《会稽刻石》等书乃“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不似“谱录类”为“因器具而及款识者”，而将之归入“史部·目录类”。因此，“因器具而及款识”的原则，也将谱录类与目录类图书区分开来。

考古类谱录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一般先记器名、藏家，然后摹绘图像，记该器物尺寸、重量、容量，列铭文之摹文及释

文于后，并记录字数若干，然后为考证文字，有的还兼及出土地点、推断时代及其品评等内容。如吕大临撰《考古图》一书，就详记藏家、器名及其器容、尺寸、重量、铭文，并精绘古器图像，引以经史考证，再加以断代，体例十分成熟，被后人视为博古类图书的典范。赵九成所撰《续考古图》，体例与《考古图》同，然不及《考古图》之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书“先后不以类从。盖随见随录，故第五卷所载独少，或有铭而不摹其文，有文而不释其读者。其收藏名姓皆载图说之首，云右某人所得，与前图注姓名于标目下者例亦小殊”。然摹形记款，考证定名，南宋所见之器，往往于此可得。《古玉图》一书记录器名以后，有的在器名下加以品鉴，如“三螭毕琫”一名下品鉴道“珣玉螭螭神品”，器名右绘图，记玉器大小、色泽等，考证涉及断代及出土地。王俅撰《啸堂集古录》的体例稍有不同，即记录古器之名、铭文摹文，然后释文于摹文之下；张抡撰《绍兴内府古器评》，只记器名和铭文字数，然后考释铭文，品评形色，兼及断代。

考古类谱录兴盛于宋代，这与宋代文人、学者和官员以及民间市井雅好古器典藏等社会文化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爱好赏玩，促使古器在市场流通，刺激了民间发掘古器以牟利的行为，从而使得古器搜藏、赏玩之风更在社会上、士人中风行。虽然宋人收藏古器物的风气如吕大临《考古图记》中所言为“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但是人们为便于查找，遂为所收藏和所目见耳闻的古